



深度

书斋起义

庄瑞琳谈出版：解答民主之后的问题，我选择比传统更传统的媒介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还能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当我们缺乏成熟的社会，只会招致更多的对骂与对立……

特约作者 崔舜华 发自台北 | 2019-06-23



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摄：陈焯辉/端传媒

办公室里，庄瑞琳忙进忙出挪椅子给我们坐。白粉墙，眺景窗，前面简单陈设著几座奖杯和一张素净异常的办公桌，一册册书本墙脚叠砌到窗缘，理论与文学并肩，社会转型与土地正义齐落座。作家吴尔芙早早说过，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而做出版的女人要的，则是更深更广的思考空间，让文字驰骋，思绪活络，让某些变化在此发生。

不做一名普通记者

关于庄瑞琳，先前一直觉得她是个披著出版人盔衣的战士，身量娇小，周身散发出不容质疑的意志之光。她创立的卫城在大型出版集团内横生生劈开一条特异路径；如今独立出来的春山，一方面承继了卫城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将议题书做得更专深笃定；而庄瑞琳对于社会环境与文化现象的敏锐知察，一部分来自她性格里的好奇与细腻，另一部分可能和其背景有些关联，从《新新闻》出版编辑到《自由时报》地方记者，再去诚品书店做出版销售分析，后来进入时报版权部，因为实在太想做书，所以转换身分当起了编辑，从第一本选书《欧巴马的梦想之路——以父之名》开始，迄今已逾十年。

在媒体与地方打滚过，庄瑞琳看见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台湾社会的转变。她当记者时已是SARS末期，适逢《苹果日报》在台湾创刊，当时还在地方跑新闻的她，见到《苹果》模式如何震荡了传统媒体：即时照片成为关键，记者必须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置身现场、捕捉新闻画面，《苹果》对旧派媒体重新抛出“什么是新闻？”的问题，所有媒体都必须好好接球，否则下场便是贬值或淘汰。同时，本土传统产业长久被大众媒体所忽视，但产业本身正在发生剧烈的质变，从解严以来，社会处于未曾消停的激烈变动之中：政党轮替、核四停建乃至后来的三一九枪击案……看著台湾一路以来的颠簸动荡，庄瑞琳决心成为全职做书人，用一步步扎实的论述代替一篇篇抢时效的报导，“我们已身在民主的屋簷下，许多冒出来的新问题却未能被全面地思考甚而找到答案，比如说核电、废死、同志人权。媒体不会在第一时间报导所有需要被回应的问题，只有回到书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问题的脉络。我们曾以大量的激情去争取甜美的民主，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整理过程、提出解答。”庄瑞琳说。

近年国内书市急遽缩减、产业规模缩小、印量日趋减少，但她所看重的恰恰是出版拥有的思考空间，“我看似选择了一个比传统更传统的媒介，但我的企图是用更长的时间去换取更多重要问题的讨论。新闻的寿命非常短暂，一个记者写了再轰动的报导，效果只有一天，

但一本书的影响幅员会不断扩散、讨论会不断深化。书的篇幅跟媒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历史性的回顾或呈现结构问题，需要足量的篇幅空间；后期新媒体的出现，开拓了更多深度报导的空间，例如《烟囱之岛：我们与石化共存的两万个日子》谈台湾的石化产业，一家新媒体要做这样的题目，必须花上数年用许多专题去整合、讨论，也许是像《报导者》这样的新媒体，才有办法追踪一个问题整整三年——这其实是用写书的架构去推动专题，成书之后，更落实为一个必须深入研读的东西，可以回答一路以来发生的问题。”

重要的是，比起做记者，做书更适合她，“每个人都在寻找成为社会人之后安身的位置，我很关心社会，但我理解自己无法成为第一线的记者，在那样的生态竞争下，我也许只能做一个普通记者，但我也不是能够透过组织去做社会运动的人，也许我的特质更适合成为一个对话者或连结者，把不同的声音、立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某个理念去高声倡议。当然，我做的书也有立场，但跟直接做运动不同，编辑是一种相对之下隐形沉默的角色，刚好化解了我与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我选择用出版参与社会问题的方式。”庄瑞琳说道。

媒体不会在第一时间报导所有需要被回应的问题，只有回到书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问题的脉络。我们曾以大量的激情去争取甜美的民主，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整理过程、提出解答。”



春山出版社出版公司的书。摄：陈焯輝/端传媒

市场即战场

从时报、卫城到春山，总觉得庄瑞琳一直在做很难、很深、很厚的书，不论是国际政治、历史、环境或人权，越艰难的书她越比别人更投入地去编、去推。但在市场现实下，这样的选书路线与出版策略如何抓住读者的眼睛、书市的胃口？

庄瑞琳认为，所谓的“策略”即包夹了市场与非市场的双重因素，她不是不在意市场，而是不依附市场，“对我来讲，选书的重要性即在于开拓尚未存在的市场，大家都看得见当前受市场宠爱的题材，但为什么严肃的议题就不能卖？例如《烟囱之岛：我们与石化共存的两万个日子》谈石化业困扰台湾整整五十年，大家为了空污而办公投、上街游行，但没有一本书好好地去谈土地、健康与人三者间的关系，难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性吗？而在同温层之间被认定有市场性的书，难道就没有议题性吗？”

对在地文化与社会议题的关注，将庄瑞琳推向自制书的战场，置身第一线去发掘作者、发现问题，“做翻译书时，因为不会亲自与作者打交道，所以我更在意这本书能不能回答新近出现的问题，以及作者是否看见了当前正发生的时代问题，像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不过，翻译书做到一个阶段，我发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无法由这些书代言，所以，自制书的意义正在于：我们必须重新找回问题发生的方式。”例如能源转型问题，当今沸沸扬扬的核电争议，不能仰赖欧盟或美国的经验得到解答，唯有与地方脉络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意识到症结所在，至今徒具形式却无法落实的《两人权公约》亦是如此。需要讨论的议题太多，作者数量却相对匮乏，这是做自制书的一大挑战，对于新人，庄瑞琳一向张开双臂欢迎，“我在乎作者的热情和潜力，这样的人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为何要当一名作家。作者与议题是无法分割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每项议题需要不同的声音与观点，我认为，只要有作者愿意投入某个特定议题，我非常愿意给予陪伴，例如《成为他自己：全人，给未来世代的教育乌托邦》谈全人实验教育，是非常独特的题材，即使作者是没有出版经验的研究生，但因为她有热情，所以我们愿意陪她两年，重新改写整部论文；又例如《幽黯国度：障碍者的爱与性》谈障碍者的性权，虽然是属于少数人的议题，但在个体性之中能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公共性，这样的书就值得被出版。”

选书的重要性即在于开拓尚未存在的市场，大家都看得见当前受市场宠爱的题材，但为什么严肃的议题就不能卖？



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摄：陈焯輝/端传媒

写诗但不做诗集

三年前，庄瑞琳推出诗集《神秘的季节》，她从年轻时开始写诗，期间一度辍笔，直到创立卫城之后才重拾诗行；她偏爱十九世纪的诗人，喜欢普拉斯、艾略特与狄金森，诗陪伴她走过整趟艰难的创业路程，越忙越要写，诗之于她像是明矾一枚，沉淀日常工作的纷扰繁重，使震荡疲惫的身心回归清净无垢。不过，不像其他诗人编辑，庄瑞琳从未亲手操作一部诗集，就连自己的诗集，她也格外地低调，对她来说，诗与诗性是两种路径，诗性可以存在于各种文类之中，尤其是小说，“以我做过的书为例子，《黄鸟》的作者本身是诗人，他曾经参加伊拉克战争，回来后写了关于创伤症后群的士兵故事，我觉得这本小说就是诗了；或是《阁楼里的佛》写二战时在美国被圈禁的日本人的故事，那时候美国有类似集中营的场所，专门监禁在美日人，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口述史，叙事形式也相对地碎裂，整部书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

自言与诗之间存在著某种紧张关系，庄瑞琳读诗倾向运用纯粹的直觉，也让她与诗在实务面上维持著一定距离，“我自己出诗集时，只想要个人自费出版，我不愿意它成为一个必须经过书市作业流程的作品，这是我想留给诗的空间。但最近我也在考虑重新出版具时代性的重要诗人，例如辛波丝卡，或者艾略特的《荒原》，每次读到赵蕤翻译的艾略特都觉得非常怀念啊。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对诗的勇气还不够，对于议题反而勇敢一些。”

曾自述想扮演“公共领域舞台的工人”，然而写作势必涉及私密的个人领域，在编辑与作者的双重身分之间，庄瑞琳善用诗的能量调节编辑技术，写作让她能更深入地体会身为作家的状态、扮演作家的支持者与陪伴者，并探究作品内部的感性光晕，“如果我选择做一名编辑，那么我势必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作家，至今，我还是不太愿意声称自己是诗人，诗是我的兴趣，编辑才是我的职业。”

她认同传奇编辑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的观点，这位与费兹杰罗、海明威等小说家渊源甚深的名编，将编辑定义为“作家的仆人”，“柏金斯提过自己很讨厌讲座跟访问，因为编辑不应该讲这么多话。我也觉得编辑不该发言太多，而该专心思考作者与作品本身；编辑的专业建立在一种个人性的服务之上，而诗为我提供另一条互补之道，我写某首诗可能是源于我正在做某一本议题书，或苦苦思索某个关于经济学的问题，只是我以诗

的形式隐讳地表达；如果没有诗，我没办法把书做好，也没办法在公共领域讨论我关注的事情。”

开拓新的议题市场，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辛苦更寂寞，更需要某种类似信仰的事物，让自己步过死亡之荫而获得重生的契机，“接下来要面对的议题包括莫拉克十周年、‘九二一’二十周年，我心想：天啊，台风和地震又要再折磨我们一次！除了这种书格外难做，社会上也有太多问题还没解决，觉得困顿的时候，我只能倚靠诗，让自己每天都像第一天做书，去相信出版的力量。”

“处理太多的议题之后，我意识到纯粹的理性无法替人类的共识找到出路，人与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养这份感性，得透过文学的力量。”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团体发起集会，参加者在大雨下举伞等候投票结果，一名支持者在看书。□摄：陈焯輝/端传媒

在文学里探求人的处境

2016年9月，卫城推出《字母会》（A to Z），这项集结台湾当代众多小说家的出版与写作计划，至今仍不断地在衍续之中。向来擅长触碰议题的庄瑞琳，对文学的责任与角色有自己的看法，“处理太多的议题之后，我意识到纯粹的理性无法替人类的共识找到出路，人与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养这份感性，得透过文学的力量。”

见证过小说出版的黄金时代，庄瑞琳认为，小说如今回到一种重新盘整的状态，纵使销量不如十年前猛爆，但文类内部更深刻地在整理自身、寻求对话，“透过文学，我们可以找到和解的可能。比方说同志婚姻，同意与反对两者间是绝对对立的，但如果你读过胡淑雯的〈C：独身〉、陈雪的〈D：差异〉，你对跨性别者的世界会多一层同理。文学的优势是必须透过‘人’这个载体去讨论问题，许多议题的便不那么刻板僵硬，包括统独、核能、同婚、废死以及原住民传统领地等问题，还原到最基本的单位，就是身为一个‘人’的处境，所以，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也许比研究马克思理论能更理解工业革命，即使现在的专业分工如此精细，我仍旧认为小说能够在某个层面上统整所有人的问题。”

“我这几年关心很多人权议题，包括环境人权、同志婚姻、跨性别者人权、原住民传统领地恢复，以及家庭功能失常的孩子教育权等等，对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是处于‘民主之后’阶段的这个社会必须去面对、处理的，简单来说，我们应该对于什么是‘基本的人’这件事拥有集体的共识，倘若缺乏共识，就无法继续讨论。”庄瑞琳以美国宪法为对照：1944年，罗斯福总统提出〈第二权利清单〉制订方案，这份清单讨论的重点，在于在一个新时代，国家应该要提供人民何种保护，并重新去确认何谓安全的基本生活，“现今，台湾所继承的宪法处于某种被冻结状态，我们能不能进入属于自己的第二权利清单、赋予新的社会问题一定的保障空间？这关乎到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还能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否则公投重复一百遍结果都一样，当我们缺乏成熟的社会，只会招致更多的对骂与对立，假如文学持续衰弱下去，这份权利清单也不会产生，这不仅仅是法律学者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族群的冲突、政治的分裂、环境的崩坏，最终都需回归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身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存处境，“对所有议题的讨论，最核心的是，要怎么把一个人应该如何完整地、好好地活著这件事说清楚？文学承担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出版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